

八九民運溯源

周玉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一九八九年的大陸民主運動，其血源可溯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其後一九五七年的新五四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一九八六年的新一二九運動，可謂一脈相傳，彼此的內容固不盡同，但抗議的精神則一。

五四運動帶動了新文化運動，四五運動揭開了日後「北京之春」的序幕，兩者皆由政治運動擴展成思想運動。五四運動為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表現，四五運動則偏重對民權的追求，反對秦始皇的封建社會重現即其一例，新五四運動主張除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亦為同例。後二者的另一共同點，是對大陸當局表達強度的不滿，也都造成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

新五四運動的領袖高舉五四的旗幟，希望將學生運動擴展成全民運動，但終被封殺。相形之下，五四運動可謂從精英主義演變為民粹主義，新五四運動本身則表現精英主義的色彩。至於四五運動，自始即為民粹主義的濃厚氣氛所籠罩。以上三種運動的參與者，出身不盡相同，但主力皆為青年，八九民運即得其真傳。

關鍵詞：五四運動、新五四運動、四五運動、新一二九運動、精英主義、民粹主義

* * *

一、前言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起，大陸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經五四運動七十年等因素的激盪，愈見波瀾壯闊。六月四日，中共中央下令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展開慘絕人寰的屠殺，北京學生及市民死傷無數，舉世為之震驚。四十年來家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山河，開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浩劫，今已十年矣。

八九民運的血源，自可上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其後一九五七年的新五四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一九八六年的新一二九運動，可謂一脈相傳，彼此的內



容固不盡同，但抗議精神則一，值得加以探討，以明真貌。

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帝國主義壓力下的反彈，所掀起的民族主義巨濤，沛然莫之能禦。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宣戰後，以驅逐山東膠州灣租借地的德人為理由，出兵山東，攻陷青島。次年一月，更提出自有不平等條約以來最苛刻的二十一條要求，使得中國的地位嚴重受損，土地、主權皆將不保，首當其衝者即為孔子的故鄉——山東。此時日本突在沿海各口增兵，顯欲以武力威脅。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五月九日，袁世凱以「國力未充，不能與人兵戎相見」，正式覆允，遂使「五七」與「五九」同為國恥日。四年以後，北京學生為挽救危局，並紀念國恥日，乃動員示威，結果箭在弦上，不得不提早數日而發，即成青史留名的五四運動。

前此，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中國在法理上亦為戰勝國，乃派代表出席次年一月召開的巴黎和會，頗欲乘時取消各國不平等條約，便向和會提出，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收回租借地、廢除日本二十一條等。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和會三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喬治、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秘密集會，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所有利益都轉給日本，絕口不提日本在一九一四年所作「歸還中國」的承諾。巴黎和會失利的消息傳回，群情驚憤，終於爆發了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上午九時，北京大學、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工業專校、警官學校、醫學專校、農業專校、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校、法政專校、稅務學校、民國大學等代表，在法政專校共議如何演說、散布傳單、赴各使館、到親日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住宅數其賣國之罪，陸軍學校學生代表也列席其中。會議並通過以下五點：1. 通電國內外各團體，共同抗議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案；2. 設法喚醒全國國民；3. 準備五月七日在各地召開國民大會；4. 聯合北京所有學生，組織一個永久機構，負責學生活動及其他社團的連絡；5. 本日午後遊行示威由天安門出發，經過東交民巷，以及崇文門大街等商業鬧區^①。商議既定，各校代表紛紛返回準備。

當天下午一時半，北京各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廣場，排隊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行進，沿途散發了這份傳單：「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

註①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05.



同胞立下兩個信條：(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啊！」^②這篇由羅家倫撰寫的宣言，後被喻為「集體的菲希特告德意志國民書」^③，說明了五四運動的目的。

五四運動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是國人心之所嚮的壯舉，一旦爆發，萬方景從，學生立獲知識界領袖的聲援，並取得都市商人、工業家和工人的支持，不惜罷市罷工，與學生攻守一致，形成史無前例的聯盟，不久即收宏效。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國內各團體和私人要求和會專使拒絕簽字的電報，多達七千通左右。當天在巴黎的留學生、工人與華僑把代表們包圍起來，直到法國人鳴砲向世界宣布凡爾賽條約已簽字後才散去。稍早的六月十日，北京政府已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稍後的九月二十日，被迫出走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重任舊職。五四運動時學生的呼聲，至此獲得較為滿意的答覆。十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演講時指出：「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④證以辛亥武昌之役，革命黨的口令是「同心協力」，皆說明團結可以奏效。一九二三年夏，孫先生在廣州大元帥府接見北大政治考察團時，對五四運動仍極嘉勉，認係克盡了愛國的天職，並賦以學生「首都革命」的厚望。孫先生對五四運動的關切與肯定，出自革命家兼思想家的心情，五四運動的革命兼思想成分也就顯而易見了。知識分子在喚起民衆的過程中，將新思想帶到全國各城，這是向下紮根的工作，也是前所未見的狂飆運動。

五四運動的原始動機在護土救國，本質上是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革命，目的在喚起民衆，躋中國於自由平等、富強康樂之境。欲達此目的，首須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次須實行民主、發展科學，數十年來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違反民主的政權，既不以民意為基礎，則人民非其資產，知識分子尤屬債主了。

三、一九五七年的新五四運動

一九五五年底，中共發動「肅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多達一百四十萬名。次年五月，毛澤東提出旨在安撫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口號。一九五七年二月他重彈此調，以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同年五月一日，中共正式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大家以「鳴放」來幫助共產黨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中共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極盡廣開言路的表態，於是五、

註② 羅家倫，「五四運動宣言」，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頁一。

註③ 胡秋原，「評介『五四運動史』」，收入周策縱等著、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初版八刷），頁二五二。

註④ 孫中山，「救國之急務」（民國八年十月十八日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講），收入國父全集第二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訂（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七十年八月再版），頁一八一。



六月間，大陸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乃至共產黨員爭取民主的呼聲，就以星火燎原之勢展開了，其中青年學生的鳴放可謂最強音，此即新五四運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頤和園集會，商定在五月四日晚間舉行自由民主大會，用大字報、討論會等方式，公布中共的劣跡，並創辦一個刊物，開放部分組織以吸收同學，展開更廣泛的接觸，向知名人士和各大專發出民主接力棒，以擴大社會影響等。會中還決定為顯示力量，將理論鬥爭的中心，放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北京大學，以及被指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人民大學，其他各校則全力支援這兩校的活動。稍後的事實證明，這些計畫全部兌現。

兩天後，各校幾乎都舉行了五四紀念晚會，其中以北大最為熱烈，主席致詞時表示，五四精神已被扼死八年，照當權者的解釋，民主自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青年的精神業已窒息，如果抗爭的話，肉體也要毀滅，五四之家的北大學生不要再血灑廣場了，要使廣場發出民主自由的芬芳，用大家的力量，借北大的屍，還五四的魂。致詞既畢，全場掌聲雷動，高呼「五四精神萬歲」等口號，然後多人登台演講，指控中共對學術思想的禁錮，晚會至深夜才告結束。五月五日，北大學生譚天榮貼出名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強調中共的教條主義統治只是打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招牌，已轉化為自身的反面，所以大家應團結起來，組成有力的十字軍，把中共的統治翻轉過來，鞭撻至粉碎為止。這篇論文式的大字報，被視為新五四運動的誓詞^⑤。譚天榮等人隨即成立「百花學社」，在哲學思想上仰承黑格爾、斯賓諾沙、恩格斯的邏輯系統，希望藉此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追究史達林學說的本源是否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該社在兩日內即已發展到近兩千人，後又在各校成立了分社，總社仍在北大，而於五月十九日召開代表大會，遂成為新五四運動的核心組織。

「百花學社」成立後，新五四運動即向各地伸展，北大學生訪問團分別到天津各大學串連，各校也紛紛響應，例如清華大學成立了「庶民社」，南開大學成立了「自由廣播」等，天津大學成立了「鳴放社」等，人民大學林希翎也組織了「自由論壇」，武漢大學成立了「火焰社」，並與湖北醫學院、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師專、中原大學等同時宣布罷課，組成師生聯合陣線，重慶大學組織了「聲援北大同學會」，蘭州大學也有「赴京請願代表團」之設。總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到六月初，新五四運動普獲大陸學生的支持，僅北大一校就提出了四千四百七十二條抨擊中共的意見。中共驚恐之餘，開始變臉反撲，發動反右派鬥爭來鎮壓。中共估計，右派的力量不容忽視，新五四運動參與者自為其中的精英。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其中有如下名句：「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⑥此處所謂「陽謀」，只是「事後孔明」的誇詞。毛澤東鼓勵鳴放的本意，在使知識分子等為其所用，結果不

註⑤ 唐柱國，北平學生反共抗暴運動紀實（台北：雙十字出版社，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再版），頁一二一。

註⑥ 毛澤東，〈八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頁四三七。



料反共之聲遍傳，如排山倒海，指向中共無可藥救的弱點，而且直攻其心臟，毛澤東在深感作法自斃的難堪後，只有食言而肥，以「陽謀」自壯了。新五四運動的大學生和任何敢言者，都在「陽謀」下受到殘酷的打擊。

四、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起，大陸人民在飽受文化大革命的煎熬之餘，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四月五日上午，群眾砸毀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湧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處，並衝入廣場東南角的聯合指揮部，下午更以火焚之。晚間中共民兵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警察和軍隊的配合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當場屠殺人民。事後北京衛戍區動員部隊在廣場清洗了三天以上的血跡，並展開追捕行動，直到四人幫本身被捕為止。

天安門運動延續了一週，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從三月底到四月四日是群眾和平示威階段，四月五日到六日是群眾激烈抗暴階段，四月七日是中共處置階段^⑦。四月四日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花海人潮中，觸目都是詩詞和條幅，包括「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熱血湧心潮，痛詞壯征歌，我按三尺劍，犬物敢禍國？」「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⑧由此可知，運動雖以悼周的形式出現，箭頭則指向毛澤東，這對於以「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自詡的現代暴君而言，無異最大的掌摑，證明大陸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四月五日凌晨，中共當局調集了卡車、救火車和大吊車開進廣場，沒收花圈、詩詞並擄人，清晨聞訊趕來的憤怒群眾，終於和當權派爆發正面衝突。抗暴的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學生、幹部和家庭主婦，也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他們父子相隨，兄弟結伴，夫妻同行，師生攜手，百萬群眾匯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此次運動發生在中共建立政權後的二十七年，證實了大陸人民在長期隱忍下的不甘就範，也暴露了中共統治的不穩，它為文化大革命奏起了輓歌，也加速了毛澤東的死亡，天安門廣場正在毛澤東的臥榻之側，咫尺之處百萬民衆的怒吼，極權者也要惴惴。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訓令，撤銷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任命華國鋒為黨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明言，鄧之去職與天安門事件等有關。此說旨在倒鄧，但予世人一種「鄧小平領導義舉」的錯誤印象，其實當時鄧小平完全與外界隔絕，和事件毫無牽連，此為鄧派復出後所不諱言^⑨。誠如事件後被捕的曹志杰在答訊時陳言：「我們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人指揮，我們沒有什麼後

註^⑦ 天安門抗暴事件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五日出版），頁六。

註^⑧ 另有一首詩暗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即將垮台：「黃埔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見嚴家其、高舉編著，中國「文革」十年史下冊（香港：大公報出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頁五七八。

註^⑨ 本報記者，「天安門事件真相一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台。」^⑩現場目擊的外國記者也指出，五日的抗暴行動顯然不是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的，而且肯定沒有打起鄧小平的旗號，記者在廣場上幾個小時，從未看見或聽到鄧的名字。凡此皆可證明，四五天安門運動之功與鄧小平無關。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新當權派因本身政治利益之需，開始為五四運動平反，強調四人幫的鎮壓之舉才是反革命，「中國不是四人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只有人民才能推動歷史前進。」^⑪其實，中國也不是共產黨的。鳴放時期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就說：「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不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⑫鄧小平表面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稍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逮捕魏京生並判重刑，說明了鄧式民主的本質，也展示了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一貫態度。

五、一九八六年的新一二九運動

五四精神至八十年代的大陸，又有了舉世矚目的展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在一二九運動五十一周年時爆發了學潮，迅即蔓延大陸各地，規模之大，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所未曾有。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免除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職務，罪名是「在不同場合散佈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企圖擺脫黨的領導和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辦學思想，給中國科技大學帶來極惡劣的影響，這些錯誤思想在這次科大學生的鬧事中充分暴露出來」。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的「國策」，背離者可謂罪孽深重。一月十七日，中共開除了方勵之的黨籍。

此次學潮的共同口號是「要民主」和「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學並質問中共統治的基礎，同濟大學呼籲打倒官僚主義，南京地區的學生要求打倒專制，天津南開大學建議效法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的起義，北京大學更指斥中共領袖為暴君，中共政權「在每一方面都與我們過往最暴虐的封建君主制度一樣。」^⑬如此激烈的言論，較之五四運動或新五四運動不遑多讓。總計一個月內，至少有一百五十所大學的青年加入示威行列，大陸各省除了西藏和青海，都有官員匯報學潮的消息。中共惶恐之餘，在上海、南京、北京、燕湖、武漢、青島、太原、天津和四川各省市展開逮捕行動，對象包括大學生、留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等，鄧小平且下令清算自由化的「頭面人

註⑩ 王宏志編著，天安門廣場革命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頁一〇九。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葛佩琦，「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人民大學黨委會座談會上發言），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國青年報，收入大陸青年的怒吼（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二）（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頁二七。

註⑬ 陳力生等編著，野火春風—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學生民主運動紀實（台北：中國大陸雜誌社，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出版），頁一〇六。



物」，作家王若望與劉賓雁也被中共開除黨籍，益證方勵之事件並非特例。

方勵之顯然服膺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呼籲大陸知識分子挺起脊樑做人，不要唯上是從，應該自我貴重，一旦如此，力量即出。同時，大學必須是思想中心，要醞釀自由民主的空氣，培養愛好真理的意識，轉變高等教育的方向，使知識分子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此種蔡元培式的民主辦學構想，一度獲得中共稱許，隨後猛遭批鬥，其反覆無常可見。五四運動後，北京政府在學生和輿論的壓力下，不久即請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長。中共則視學生如無物，大陸更沒有新聞自由，方勵之的回任自不可能。他被安排到北京天文台擔任研究員，夜觀天象，擁有一片星空，在中共看來，這已經是德政了。

民主與人權的定義不止一端，方勵之的觀點接近法國的盧梭，此與五四人物略同，而時代性過之。他確信民主本身的含義，首先就是人人有自己的權利，然後組成一個社會，所以不是上面給的，是與生俱來的。人權在大陸上非常陌生，其實此說不足為奇，即人類天生具有生存、生活、婚姻、思想、受教育等權，一如自由、平等、博愛，是自然資源，也是歷史遺產，肯定值得爭取，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由此可知，民主與人權密不可分，是天賦的，非恩賜的，但大陸此時既已退化到黑暗時代，盧梭式的言論自如洪水猛獸。盧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便是一七六二年的社會契約論，強調個人自由與社會相一致。他為了推翻君權，便主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說。此說影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甚大，方勵之也不例外。

抑有甚者，方勵之公開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所謂指導總是做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確的成果。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錯」。談到好好學習，原為學生的分內事，「但是說這一機會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是完全錯誤的」。至於深圳青年報請鄧小平退休，他認為是很自然的現象，「我覺得這當然是大家表示的意思，是可以的。」^⑭凡此言論，在中共看來可謂大逆不道。方勵之正如魏京生，鳴鼓而攻的對象，上自馬克思，下至鄧小平，後者既有逮捕魏京生的經驗，整肅方勵之實屬必然。

六、結 論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致函鄧小平，指出該年為中共政權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七十年，有鑒於此，他建議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⑮。此函既出，吳祖光、湯一介、蘇曉康、蘇紹智、王若水等三十三位知識分子，於二月十三日以公開信連署響應。三月十四日，又有戴晴、嚴家其、遠志明、史鐵生、

註⑭ 方勵之，「現在是誰也不怕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收入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九月第一版），頁二〇一。

註⑮ 「方勵之致鄧小平函」，原載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第二三〇期，（一九八九年三月）。收入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頁四五。



周輔成等四十三位文化界人士加入聲援，而中共置若罔聞。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以北大為首的大學生湧向天安門廣場，在悼胡的名義下，高呼「反對獨裁、打倒貪污、推翻官僚、民主萬歲」，此後學生運動立刻擴大成群眾運動。四月二十日，十萬學生和市民齊集天安門廣場，提出「慈禧退休」等口號，上海、天津、武漢、合肥應之。次日，包遵信、吳組綢、嚴家其、李澤厚、北島、蘇曉康等四十七名知識分子，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籲加速大陸民主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各級黨政機構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頭狀態，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們平等對話，汲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學生們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⑥結果，中共以坦克機槍見覆，製造了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不讓四人幫專美於前。

前此，中共在四月二十三日已調動兩萬部隊到北京，準備對付五四運動七十年期間的學生活動。次日北大出現大字報，箭頭指向鄧小平，謂中國已沒有時間等強人去世才爭取民主，何況強人之後可能出現另一強人。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學生運動定位為「動亂」，立即引起公憤，次日北京爆發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五月四日，高舉「自由、民主、科學」、「反對貪污、打倒官僚」等旗幟的遊行隊伍，受到市民夾道歡迎，也有標語強調「發揚五四、超越五四」^⑦，顯示大陸人民望治心切，不以七十年前的主張為滿足。

五四前夕，李洪林、于浩成、嚴家其、張顯揚、戴晴、張抗抗等知識分子，發表「五四七十周年倡議書」，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是五四精神在新時期的延續。「民主當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們不能同意所謂中國人民素質太低因而需要推遲民主的怪論。事實證明，缺乏民主素質的，恰恰是那些害怕民主的官員。」^⑧凡此說明大陸的民智已開，但官智未開，此後學生絕食抗議，中共仍無動於衷。五月十七日，嚴家其、包遵信、鄭義、徐剛、王魯湘等三十餘位，對中共的不仁與無義發出了怒吼，直指中國還有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⑨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至此達一高潮，展現了最大的道德勇氣。

五月十八日，病中的巴金也發表支持學運的公開信：「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就是一批愛國學生為我們祖國爭取科學與民主。七十年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註⑥ 「四十七名知識分子公開信」（四月二十一日），同前引書，頁九九。

註⑦ 兆強、葛靖、思源編著，*血染的風采*（香港：海燕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頁九一。

註⑧ 「大陸知識分子『五四』七十周年倡議書」，收入*火與血之真相——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頁四一六。

註⑨ 「北平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收入張京育主編，前引書，頁二四八。



我認為今天學生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們所做的正是我們沒有能完成的事情。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身上。」^②六四屠殺後，中國的希望或化成新鬼，或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死者激勵生者，生者激勵來者，一度蔚為全球華人抗暴的巨潮。

五四運動的政治效果，至中國代表未簽巴黎和約而初步達成。新五四運動則如整個鳴放運動，其收場使知識分子覺悟到中共的不誠與無信，彼等固然獲致悲劇的命運，中共失去知識分子向心力的政治代價亦甚可觀。四五運動則加速了毛澤東的死亡和文革的落幕，鼓舞了青年一代爭取民主的信念，使他們踏著先驅者的血跡勇往直前。五四運動帶動了新文化運動，四五運動揭開了日後「北京之春」的序幕，兩者皆由政治運動擴展成思想運動，而為學術界所重視。

五四運動為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表現，四五運動則偏重對民權的追求，反對秦始皇的封建社會重現即其一例，新四五運動的主張除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亦為同例。後二者的另一共同點，是對中共當局表達強度的不滿，也都造成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昔已有之，因此而烈。

新五四運動的領袖高舉五四的旗幟，希望將學生運動擴展成全民運動，但終被中共封殺。相形之下，五四運動可謂從精英主義演變到民粹主義，新五四運動本身則表現精英主義的色彩。至於四五運動，自始即為民粹主義的濃厚氣氛所籠罩。以上三種運動參與者的出身不盡相同，但主力皆為青年，「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於此獲得真切的驗證。至於方勵之以科學家追求民主，也使人想起五四運動的文化主張；新一二九的學潮澎湃洶湧，更以五四精神的再現為目標，說明了民主與科學為中國知識分子不可或忘的理想。

新一二九運動後不滿三年，大陸又爆發八九民運，頻率之高，為四十年所僅見；規模之大，更開中外歷史的先河，印證了大陸知識分子和廣大民衆追求自由之心不死，只要中共一日不行民主，抗議的火種就一日不斷。五四以來的史實顯示，學生運動每為全民運動的先鋒，書生們身無半畝而心憂天下，手無寸鐵而不畏豪強，如能喚起民衆，不難扭轉乾坤。知識分子的力量似微而巨，拂逆者往往由盛而衰，八九民運後的中共，或遲或速，都要面對這樣的歷史進程。

* * *

註② 「巴金支持學運公開信」，收入火與血之真相——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頁四一六。



Tracing the Sources of the 1989 Democratic Movement

Yu-sun Chou

Abstract

The impetus for of the 1989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the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57,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in 1976, and the New December Ninth Movement in 1986. Although their objectives we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all these movements embodied the same spirit of protestati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dded momentum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set the stage for the "Beijing's Spring." Both developed from a political to an ideological move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 manifestation of both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including, for instance, opposition to the reemergence of Qin Shi Huang's feudal society. Similarly, the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advocate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three evils" — subjectivism, factionalism, and bureaucratism. Another common feature of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and the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at the stro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expressed during both movements gave rise to a crisis of faith in Communis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volved from elitism to populism, but the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characterized more by elitism. Holding high the banner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leaders of the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tried in vain to expand a student movement into a national movement. By contrast,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was imbued with strong populism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all these movements are young people, as were those of the 1989 democratic movement.

Keywords :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May Fourth Movement, April Fifth Movement, New December Ninth Movement, elitism, populism.

